



《国际战略纵横》第6辑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 NO.6

全球性挑战和战略运筹

Glob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主 编◎杨洁勉

时事出版社



《国际战略纵横》第6辑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 NO.6

全球性挑战和战略运筹

Glob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主 编◎杨洁勉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性挑战和战略运筹 (《国际战略纵横》·第六辑) /
杨洁勉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80232-514-2

I. ①国… II. ①杨… III. ①国际形势—文集②国际
关系—文集 IV. ①D5—53②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993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插页: 4 印张: 23.75 字数: 31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2011 年 2 月 23 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杨洁勉会长作新年致辞。



2011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王嵎生大使作了题为“东亚形势变化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报告。



2011 年 2 月 23 日，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新一届理事会选举通过新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名单，表决选举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2011 年 5 月 22 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员前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参观“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图为会员在考察船前合影。



2011年5月22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员参观中国极地中心。图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杨惠根介绍中国南极考察情况。



杨洁勉会长在与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的科考队员进行卫星通话时，称赞科考队员们是民族的英雄，祖国的骄傲。



2011年8月29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暑期会长会议暨“中国战略与上海发展”学术交流会上海浦东举行。会议围绕国际战略形势、中国外交创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以及地方人大外事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11年12月15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召开“国际核战略态势和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民防办公室、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2011年12月22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召开年会。图为郭树勇副会长主持会议，杨剑副会长做研究会2011年工作报告。



2011年12月22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召开年会。图为杨洁勉会长主持年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罗援将军就当前国际形势作了报告。

目 录

全球性挑战和战略运筹(代前言)	杨洁勉(1)
-----------------	--------

第一部分 中国国际战略理念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观	郭树勇 花 勇(15)
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 时代升华	王 忠(30)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国家主权思想发展及其 历史经验	王公龙(42)
国际关系中的二元叙述	王传兴(60)
文化自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	武心波(78)

第二部分 美国国际战略态势

浅析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	杨洁勉(93)
美国二元战略伙伴系统的建构与调适	杨 剑(102)
美国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评估: 对东亚秩序的影响与我国外交应对	刘 鸣(121)
美国创新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王国兴(150)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仇华飞(167)
论美国两岸政策的“三元困境”	赵念渝(187)
美国的南亚战略与中印关系	赵干城(200)
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报告	孙崇文翻译 夏立平校对(212)

第三部分 大国战略与热点问题

进入“9·11”事件以后的第二个十年:

国际反恐形势评析	潘 光(231)
普京关于欧亚联盟的设想:背景、目标 及其可能性	李 新(250)
国际秩序演变视野下的中东变局	李伟建(270)
中东变局的结构因素及其性质	王 健(283)
试论无极多元国际格局对全球危情与 治理的影响	叶 江(293)
北冰洋油气资源战略竞争重点浅析	张 侠 屠景芳(307)
北极环境变化下的中国安全环境研究	夏立平 邹啸东(315)
国际能源格局的演进及走势特征探析	余建华(332)
俄日岛屿领土主权争端给我国海洋维权的启示	郁志荣(355)
论信息时代中国武警政工人才的培养	黄及全(361)
试析武警力量运用的战略价值 ——从《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谈起	汪红伟(368)

全球性挑战和战略运筹(代前言)

杨洁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处于充满挑战的时代，“全球性挑战成为世界主要威胁”。^① 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和解决都需要跨国合作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面对日益突出的金融和经济问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更具有不可推卸的当代义务和历史责任。国际社会又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地不利于西方传统大国而有利于以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从而导致西方 500 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主导权的削弱。国际社会还处于国际体系改组和规范重建的时代，二十国集团（G20）在国际经济体系改组中的作用表明，一个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建设正在加速进行。而且，国际社会的理念和规范更新将具有更加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历经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成为 G20 核心成员之后，中国不仅全面融入当今国际体系，而且在国际体系中越来越占据并分享核心地位。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断上升，在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进程中，要在自我定位和他定位、建章立制、理论创新、战略运

^①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 年 9 月。

筹和政策规划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贡献于 21 世纪乃至更长时期的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

一、全球性问题的实践和理论

21 世纪是全球性问题的世纪，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挑战，国家议程的全球化势所必然。全球性问题是指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关系到全人类根本利益、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及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它具有复杂性、超越意识形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① 事关人类社会存续的全球性挑战正在逐渐塑造着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各国就与此相关的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形成以及创新方面正在加强互动。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根本在于围绕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国家为主的行为体协同其他非国家行为，建立相关的价值、规范、机制来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主要体现为国际社会就全球治理实践与理论进行的相关努力。

从实践层面来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是当今世界全球治理的主体机制。在核不扩散、能源、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还有区域层面新发展了部分国际机制，对联合国机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② 国际金融和国际发展的话语权主要被“七国财长会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掌控。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相同的地方是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更加重视利用其首要地位和硬实

^① 关于全球性问题的论述可参阅李少军主编：《当代全球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

^② 这些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盟、非盟等。

力加以推广，特别是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更为明显，欧盟则注重推广其区域合作的经验，同时在气候变化和国际发展等议题领域发挥其软性领导作用。新兴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加强了对全球治理的关注与参与，表现出较为联合自强、务实上进的态势，但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仍有待加强。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挑战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在全球治理中缺乏话语权。全球治理的前景与国际体系转型同步进行，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

全球问题治理需求加大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全球治理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缺乏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国际治理机制改革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转移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有时常常超越我们的预判力。^① 受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主要经济体在相互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困难增加，这进一步影响了其向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加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步履维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前景不明，只有国际经济机制受金融危机冲击发生某些积极变化，但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面对全球性挑战，在全球结构层面缺乏长远的设想与行动计划。国际机制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常常出现功能重叠、指令冲突的弊病，诸如全球变暖或生物多样性缺失等全球公共事务尚缺乏明确的国际机构予以管理，相互依存的世界必须找到融合共同需求的机制。^② 在

① Jim Whitman, *The Limits of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14.

② Michael Moore, *A World without Walls: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20—223.

传统大国作为主要治理能力供应方、新兴大国作为治理能力潜在供应方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仍难以满足全球问题解决的需求。

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曲折发展是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应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因素，它们可以提供全球治理所需能力、知识和价值的增量贡献，并且为此加强了包括“基础四国”、“金砖国家”峰会等在内的相互间机制性合作。作为全球治理的存量因素，传统大国意识到其在全球治理中相对能力的下降，迫切希望纳入并规范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G20 峰会是一个在世界经济管理方面的尝试。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美国并未找到解决赤字问题的长远方法，欧盟由于欧元区经济体的债务问题，使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双方虽然意识到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要性，但由于在对全球问题及其解决的认识、能力和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治理风险控制、成本分担、利益分配和发展空间等问题分歧较大，而且全球机制并未在机制上纳入这些新兴大国的力量，大国关系需要围绕全球问题及其解决进行持续互动，形成某种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合力仍然有待时日。

当今国际社会依然由国家行为体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全球性问题的跨国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的特征形成结构性冲突，并且由于国家所处情势差异极易导致对全球性问题解决中的不同视野，以及部分政治家缺乏对全球层面问题的基本认知从而未能就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达成共识，这些因素对全球性问题解决所需的国际合作产生重大消极影响。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管理由于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创新而处于失范状态，金融机构的行为不仅对国家的治理权威提出挑战，而且由于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而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成功应对此危机，不仅要求国家重建其治理能力，而且要求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健康合作关系。在处理世界经济难题的过程中，G20 峰会应运而

生，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然而又因为国家能力、利益和认知的不同而导致未能有效地协调各自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此外，受到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根本无缘 G20 峰会这一重要平台。可见，全球性问题解决需要国家发展合作精神，既能包容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参与，也能在国家之间建立对全球性问题所含之共同利益与威胁的认知，兼顾各国的具体情况，在追求共同利益之时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防止狭隘国家利益妨害全球问题的治理。

二、全球性问题解决与中国的作用

中国既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的一部分。深刻把握这一双重性是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处情形的关键之处。改革开放头 30 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并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展开互动，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界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或好或坏，在设想未来的全球秩序时，不考虑中国在其中的核心角色以及中国在塑造该秩序上的主要影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① 由于中国崛起的体量和影响前所未有，再加上部分媒体的错误引导，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产生“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期待大

^① Bates Gill and Michael Schiffer, "A Rising China's Rising Responsibilities", in Michael Schiffer and David Shorr ed., *Powers and Principles*, Washington, D. C.: Stanley Foundation, 2006, p. 99.

幅提升至超越中国实际能力的程度。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没有简单地回避自身在全球性问题中的责任与作用，而是力求历史地、科学地和前瞻性地加以自主界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国际形势和发展需求有选择地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努力贡献中国的力量。

在全球化、多极化深入发展，以及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成长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部压力所致，而是本国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规范建设中的积极作为，是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事件。无论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还是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来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已经超越了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阶段，进入探索向国际社会贡献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新层面。

当前一个重大的国际趋势是力量消长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战略和政策调整以维护其国际事务的主导权。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体系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各主要行为体正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以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同时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持续。中国作为当前历史性转折和转型的核心变量，面临着自身全球利益管理和应对国际社会更高期待的挑战。世界和周边对中国的关切持续提升，中国和世界进入新一轮的相互关系适应与调整期。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峰会外交和世博外交硕果累累，各种“文化年”和“语言年”等活动为世界文化外交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因素。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开始以新的眼光和要求看待中国，既存在对中国如何使用其持续增长的外部影响力的担忧，也存在对中国促进全球性问题解决期待。中国需要审视自我定位和适应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定位，妥善应对来自西方大国和周边邻国的质疑与期许，这种相互适应与调整期将是一个必要、长期和艰难的进程。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丰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建构“协调发展理论”，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思想，为全球治理理念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同时还要确立“下先手棋”的战略思路和规划适应形势变化的相关政策，加强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积极稳妥推进外交体制与机制改革，从而提升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外交的战略高度和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能力。此外，还要加强前瞻性的政策规划，抓住和利用好机遇，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走向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将在与世界的重新定位和相互适应中不断成长壮大。

三、历史前瞻和战略运筹

从现在起至 21 世纪中叶还有 40 年的时间，这将是现行国际体系向新的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这一过程可能难以一帆风顺，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体系风险面前，任何维护和退回传统国际体系的尝试都将是徒劳和危险的，因为那只会将人类推向共同毁灭的边缘。因此，在日益紧迫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只能认清形势、构建共识、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推动现行的基于自我利益的国际体系向追求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转型。这种新的国际体系必须以多元多极的力量结构为基础，以法治和合作为治理方式，以民主、包容和能动为规范和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新的国际体系才能动员和汇聚起所有各方的力量，携手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在过去的 20 年间，国际体系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多极倾向，

并且有望在未来几十年间完成国际体系的最终转型。从体系状态来看,以多元多极为基本结构的未来国际体系将呈现出政治权威分散化、议题关注复合化以及国际关系扁平化的特点。虽然国家行为体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仍发挥核心作用,但它必须积极调整其内部及其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

如果说国际体系转型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各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那么这种力量重组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模式、新规范和新制度。首先,新的国际体系将超越强权政治管理模式,形成以法治和合作为核心概念的全球治理模式。其次,新的国际体系要求树立新型政治观、新型安全观、新型发展观、新型文明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最后,新的国际体系要求国际机制更加开放包容、更加能动专业、更加起到引领作用。

中国作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应该支持、鼓励、推动国际体系向多元多极方向转型,积极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与世界的密切互动中壮大了经济实力,提高了政治威望,扩展了文化影响,是国际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获益者。为此,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急需国家主权的保护,但是在总体上应该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为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体系才会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平衡、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潮中获得更加健康和友好的发展环境。因此,中国应当改变满足于在国际事务中旁观的心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建设和塑造未来的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有条件为国际体系转型、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首先,中国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使它特别适合促进多元融合、兼容并蓄。政治上,中国无论在地域、人口、经济总量、历史记忆上都是公认的大国,但它又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它既有